

Opinion

■上观观察家

CPI创新高与长期解决之道

我们绝不能把CPI创新高,当成一个短期的经济现象去对待。当食品类价格屡屡成为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且这种推动力有可能长期存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摒弃短视思维的局限,以长期思维来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只有这样,CPI上涨的压力才能最终得到化解。

◎褚洪波

3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的统计数据,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如此前公众预料中的那样,同比上涨8.7%,创下近二十年来的月度新高。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6.6%,增速再创3年来新高。

2月份的CPI、PPI数据延续了两个主要特点:其一, 增速的趋同性与主导上涨因素的非重叠性。从去年至今,PPI与CPI增速的差距越来越小,这意味着PPI向CPI传导的速度在加快,二者的趋同性日益明显,但这种趋同性仅仅体现在涨幅的影响与传递方面,并不体现在主导上涨因素的重叠方面。

这一点从具体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2月份,CPI同比上涨8.7%,食品价格上涨23.3%,仍是带动CPI上涨的主因。2月份PPI较上年同期增长6.6%。从品种来看,其中,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7.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7.9%;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7.7%、15.0%。

这其中蕴含着值得警惕的信号。即CPI的上涨动能,除了粮食价格的带动,PPI的传递效应对于CPI的上涨亦构成明显压力,这使得化解CPI压力显得更为紧迫。

其二,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此前所言,目前价格上涨,仍然属于由农产品价格上升主导的价格结构性上涨,它与全面的、持续的、轮番的价格上涨引起的明显通货膨胀还是有区别的。在2月份的CPI当中,除了食品类价格上涨了23.3%,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6.6%,其他项目涨幅都非常小,像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还下降了1.4%。但

是,对于PPI传导可能引发的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必须给予足够的警惕,以防止结构性上涨向全面上涨转化。

CPI、PPI增速的趋同性与主导上涨因素的非重叠性决定着,要化解CPI的压力,应该各有侧重点,才能使调控取得好的效果。而且,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有长期解决之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南辕北辙,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目前,CPI上涨主要是食品类价格上涨带动的,对于这一成因判断我没有异议,但是,对于以短期思维——比如成立类似“应对猪肉价格上涨应急领导小组”这样的应急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我认为存在巨大隐患,因为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并非一个短期现象,而是我国转型期的生产、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粮食供应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是一个长期行为,并且,呈现出日益紧张的趋势。

从国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另一数据是2.5亿人,姑且以2亿人为准),其中,离开了本土本土到城市做工的农民工大约8000万人。这意味着,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在迅速减少——在不少地区,农业生产落在了老弱妇孺身上,他们既无精力,又舍不得投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甚至,在一些地方由于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大面积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另一方面,脱离农业生产的这两亿劳动力,不仅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劳动力,并且在收入增速也高于农民工(如2006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比2005年增长11.5%),这意味着对肉类食品、精加工食品消费能力的增强。

同时,我国城市化速度也在加快。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仅在40%左右,相比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即使以保守的60%城市化率水平为目标,我国也有50%的扩展空间。城市化的过程,既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市民过渡的过程,也是耕地面积随着城市规模扩张逐渐减少的过程。显然,食品供应紧张态势不是短期行为,相应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压力长期存在。需要强调的是,食品类价格上涨推动下的CPI上涨,是在我国连续四年粮食大丰收的情况下发生的,倘若因受灾减产,相关压力可能更大。

从国际情况来看,现在发达国家在全力以赴预防未来的能源危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粮食经济学家约翰·冯·布劳恩指出,美国将于2008年将四分之一以上的玉米用于乙醇加工,作为汽车燃料,欧盟也计划在2010年前将生物能源产量达到1100万吨。为此,世界上不少国家开始限制粮食出口,通过国际贸易弥补食品短缺的道路不仅变得狭窄,也因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日益危险。

因此,我们绝不能把CPI创新高,当成一个短期的经济现象去对待——尽管的确有春节消费因素、雪灾因素等短期因素的影响——而应该采取长期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

我认为,在粮食供应压力日益加大的今天,包产到户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应该尽快在条件成熟地区推广集约化生产,发展现代化农业,以应对粮食供应长期趋紧的态势。所谓集约化农业生产,是指在同一面积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来增加产品总量的经营方式,即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投入达一定的边际效益水平以取得最

佳经济效益。集约化农业生产既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养殖业,如集约化养猪生产,它应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合理的工艺流程,全面的饲料营养,科学的繁育体系,严格的防疫制度,将以家庭式饲养为主的传统养猪业转化成现代化工业化的养猪生产。

我曾在去年访问澳大利亚,结识一位澳大利亚的农民,他拥有一个120公顷的农场,每年的净收入折合成人均达到近500万元,而这个农场只有他们一家四口人在经营。集约化生产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能节省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我国部分地区“用工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无疑能起到一箭两得的效果。

集约化生产要求生产要素的相对集中,生产集团化、规模化,而目前,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集约化生产经营的条件,如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一些地方出现地多人少,甚至造成大量土地荒芜;市场化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流动性越来越高,农村中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才也在增多等等。同时,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呈现规模化、加速化的趋势,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制度面临转型,除了以往常见的“合作经济组织参与流转”、“土地流转经营公司参与流转”、由承包农户将土地使用权直接转包给业主的“业主租赁”、将土地经营权交给集体再由其转包给业主的“反租倒包流转”等模式,又涌现出“股田制”、“农地招商”等多种模式(详见2008年2月28日《半月谈》报道)。这为农业生产向集约化、现代化过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农业集约化生产已经做得有声有色。

当食品类价格屡屡成为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的时候,当这种推动力有可能长期存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摒弃短视思维的局限,以长期思维来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只有这样,CPI上涨的压力才能最终得到化解。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经济学院院长)

“草根金融”的民间创意值得期待

◎倪小林

此次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菜篮子”、“米袋子”的事情议论颇多,相关农民创意找资金求发展的故事也不少。说明“中国尤努斯”们,在用草根创意试图打开农村金融的瓶颈。孟加拉出了个尤努斯,为了孟加拉国的农户贷款,发明了村民联保小额贷款模式,获得了诺贝尔奖。人们期待尤努斯试验在中国落户,中国农民也能在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的时候方便获得贷款。

农民的需求催生了遍及全国农村的小额信贷公司,它们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有民间基金会捐助款,有农民自愿入股的钱,还有有识之士主动捐款,一些地方方还有开办的正规银行,也伸手扶植一把,给了不少的支持。已办的不少小额贷款公司,很受农民的欢迎。虽然,这些大都还是蹒跚或短腿的试验项目——尤努斯把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叫做“火腿公司”,可是,农户们还是很欢迎。相对正规军的银行,民间的小金融只能算是“草根”;相对大银行,散见于全国农村的小额贷款、担保公司也只是十足的民间产物。

刘永好也算是新新农村人,靠创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如今产业已根深叶茂,才有可能如此大胆地开起担保公司,专门为养猪户担保,保证独门独户的养猪户不缺生产性资金,也保证了他的生猪饲料等产业链能够持续转动。早在几年前,世界银行在中国农村的调查就发现,农民和公司挂钩,创设金融担保公司,为一家一户农家解资金困局是一个出路。刘永好的担保公司据说要由如今的两家发展到十家。看来,来自草根的创意还是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还会看到外资银行下乡的冲动好像比内资银行更大。汇丰银行在湖北随州的村镇银行开张;

法国美信集团与世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共同投资组建的南充美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也已开业。他们两家都是面向农民的金融服务商。他们为什么要远离城市到农村发展,肯定不是因为单纯为农民服务,他们看重的是未来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和诱惑人的盈利空间。如果按照刘永好在两会上发言的测算,中国农村已经转移出去2.5亿农村人口,而不是专家计算的1.3亿,那么中国农业下一步生产规模化和科学化将会唱主角。更多农民成为肉蛋菜的需求者之后,农产品集约化发展是今后的重中之重。外资银行要扩大在农村的地盘,是因为目光前瞻。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那些真正的土生土长民间小额贷款公司,如今的日子也是喜忧参半。一喜是有市场,有需求,农户间互相担保也有动力;忧的是到生产集中投入资金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经常捉襟见肘。只贷不存的控制,加上如果放任完全农户小额自救,没有适当的政府引导,没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让农民盲人摸象般的摸索不是持续发展的办法。前不久,对于打通正规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的呼声很高,也有高层人士回应可以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联合向银行贷款,对于草根金融来说也不失一条路。只是不要因为给钱了而改变了“草根”的性质。

笔者并不是认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农村发展金融服务没有什么先天优势,不过他们在中国农村推行的服务是完全采用农户需求的“土办法”,硬让后天劣势成了优势,他们没有“拔苗助长”强拉客户,而是用产品的价廉物美服务征服农户。经过几个月的运作,他们不但没有收缩战线,还将扩大地盘。可见,农村金融的发展过多强调规划和原则就有些过犹不及,不想失去未来的农村金融市场,唯有尊重民间创新的热情。

对市场化调节手段不要太迷信



◎余昭

两会期间,我们听到非常多的建设性建议,也听到很多争论激烈的建议,这是我国政治日益民主与开放度体现。但是,对于过分迷信市场化调节的建议,我认为值得商榷的。类似的这种建议诸如: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提议,应当向国外大学学习,允许大学招收部分高价生以解决大学债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成贵提交了《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提案,建议以有偿方式来调节城乡人口生育调节,提出“城市居民付费获得二胎生育指标、农村居民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获得补助”,随即在代表委员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允许大学招收部分高价生以解决大学债务,可能导致很多负面影响:

其一,它首先等于确认了高校盲目扩建等行所积累的债务的合理性。我国高校债务的累积根源在于盲目扩张,在于它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成本费用可以随意向教育消费者身上转嫁或分摊,因此,解决这种债务的累积根源在于盲目扩张,在于它没有合理的而有效的机制让内地能充分分享到经济成长的结果。

明白了这些道理,政策方向就清楚了。明白,土地虽然在物理意义上不能动,但它作为一个数字是可以动的,政策要让这“不动产”在区域间动起来。第二,劳动力流动要更为自由,如果土地动了,劳动力不动,沿海地区必然过早出现工资上涨,而内地则仍然需要为大量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中央的地区间转移支付要投向更为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不应只是简单地起均衡富的作用,更要避免投向一些内地缺乏比较优势的“项目”。如果这些都明确了,那么,最后就只需要有个“算法”来实现土地使用的跨区域交易了。

倘若实行这一做法,就意味着富人可以通过金钱换取多生子女的权利,在操作上不可避免会出现富人得到生育权倾斜的现象。

这还容易导致人口增长的失控。因为,一些人在卖掉生育指标获得收入后,可能继续偷着生育,使得指标变成一种投机性工具。计划生育政策是一项国家,它首先要兼顾公平,这种公平绝不能被经济手段所打破——这一原则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改变。

另外,对于一些合理的市场化调节手段,也应强调其本义,以免市场化调节手段被演变成金钱化手段,从而背离政策设计的初衷。比如,环境税。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材料所所长贾康呼吁,目前我国具备开征环境税的基本条件,应抓紧时机将其纳入议事日程。贾康认为,单靠法律和行政干预已远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要更多地利用基于市场机制的税收或收费等经济杠杆。

但是,我们看到,已经采取的一些收费、收税措施并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如排污费,收取排污费的目的为了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也明文规定,排污费的使用应当全部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但是,到2005年底,全国有278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有的城市虽然建了污水处理厂却处于闲置状态。排污费实际上变成了只收费而不处理,使这项收费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其实,法律和行政干预并非失策,关键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西方国家也曾经经历过环境严重污染的状况,但是,它们制定法律,要求企业必须出资对污水进行初步处理,倘若初步处理未达标,将采取追溯的方式推算出以前的排污量进行严厉处罚。经过企业初步处理的污染才可以流向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净化后,才能重新流入河中,而此时的河水已经非常清澈。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严厉法律规范和强制下的程序,即使开征环境税,其作用也可能大折扣。

而“实行城乡间人口生育指标自愿有偿调节”的建议更不妥。该建议的核心是:城市有生育二胎愿望的家庭可以提出申请登记,申请者获得生育指标需要交纳一定费用作为“人口发展调节基金”,主要用于补助放弃生育二胎的农村家庭。

倘若实行这一做法,就意味着富人可以通过金钱换取多生子女的权利,在操作上不可避免会出现富人得到生育权倾斜的现象。

四大因素推高 CPI 需加大组合拳力度

◎哈维铭 邢志强

通胀压力一段时期内还将持续,单一工具无法奏效,政府将继续“组合拳”;政府不能很快抑制物价上涨;这取决于物价上涨的推动因素中哪些是政府可以控制的。目前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短期的雪灾因素。雪灾除了造成运输中断和物资短缺外,还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这可能推高今年食品通胀压力,因为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历来都是供给冲击造成的,需求增长一直十分平稳,但供给波动性较大,一旦减产就会造成价格上涨。

二、美元贬值推高国际大宗商品

品价格因素:自2007年开始的本轮通胀具有全球性,归根结底在于:美元贬值向全球输入通胀。本轮大宗商品与农产品的通胀与美元贬值完全同步开始。过去5年,美元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了35%,而同期反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CRB价格指数上涨了100%(包含能源)和118%(不包含能源),反映全球农产品/粮食价格的标普高盛农产品指数上涨了152%。

美元贬值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通胀压力最为明显,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发展中国家近期通胀压力都不断高涨,这是因为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恩格尔系数较高(消费支

出中很大一部分是食品),其CPI中食品权重比较高,而且新兴市场普遍还有较大的建设投资需求,因此农产品通胀和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带给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显著大于对发达国家的。在美元反弹以前,这一输入型通胀压力不会消失。

三、中国自身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上涨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四、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成为货币政策的最大桎梏,造成持续多年的货币扩张和流动性过剩。

以上四个因素中,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有汇率和要素价格,却无法控制雪灾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美元

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因此,通胀压力在一段时间内还将高企。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受灾害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又在美元加速贬值下高涨,通胀压力将保持高位,且鉴于出口增速进一步下滑,政府不大可能采取一次性升值的措施,因此,应对通胀压力无法依靠单一政策,而会继续采取“紧货币,宽财政”的组合拳,行政限价还将继续、将加大补贴农业生产和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人民币亦加快升值。鉴于目前的高通胀压力以及大量央票和国债正回购将在3月到期,央行本月可能加息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作者单位:中金公司)

■专栏

乐见土地跨地区“交易”一举数得

◎陆铭

中国是个区域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国家,如何使得中西部地区最大可能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各方研究、讨论、琢磨了多种战略。我在多个场合多次谈过有关经济集聚和城市规模的问题,强调这样的想法:不能牺牲东部地区来追求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几天前,来自绍兴的学生告诉我,她了解的一些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大规模转向内地投资,因为当地似乎已经没有房地产获利的空间了。这是很让人担心的信号。

现在,中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通过政府倾向内地的政策来平衡区域发展,比如说限制沿海地区的土地供给和劳动力向东部的转移;另一条路是继续推进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聚,如果是这样,就应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沿海地区的土地供给。后一条路看上去是与区域平衡发展的目标相违背的,但实际上,这种背离只是短期现象,从长远来看,只有促进各大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才能国家走上发展的道路。这也是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不必重复那些国家走过的道路。但问题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硬性通过政府的“平衡发展”政策来实现平衡的呢?韩国认为,他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是经济集聚做得过头了,而是经济集聚和区域间分工还远远不够。为什么不可以进一步通过经济集聚做大蛋糕的同时,来实现平衡发展的目标呢?土地跨地区交易正是一个既可以促进集聚,又可以帮助内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机制。

们的“平衡发展”政策是成功的,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可是,恰恰是首尔国立大学的朴杉沃教授送给我的一本介绍韩国经验的书上有这样的数据,即使政府大力推行首尔的分散政策,首尔的规模仍然在长大。再看看日本,日本政府也曾想分散东京的功能,结果是,当东京人口下降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衰退的时候。最近几年,东京人口重新呈现增长态势,而日本经济增长也更快了。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可能有人会说,平衡的问题就不重要吗?重要,当然重要。问题是,如果通过行政方式减缓东部的发展速度,这样的平衡发展不就是日本曾经走过的“蛋糕做小”的道路么?这样的选择可持续吗?为什么不可以进一步通过经济集聚做大蛋糕的同时,来实现平衡发展的目标呢?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是经济集聚做得过头了,不是!中国的经济集聚和区域间分工还远远不够。中国的真正问题是,当蛋糕做大了,怎么让内地得到更大的份额。实际上,是可以找到这样的机制的。

我以为,土地的跨地区交易就是一个既可以促进集聚,又可以帮助内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机制。我赞成政府通过总量管理来控制土地供应规模,也不反对保护耕地的总量指标按地区分解到每个省、市,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允许内地省份将土地指标转让给沿海省份,不管是一次性有偿转让(相当于“卖”),还是长期的分享(相当于“入股”),内地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分享土地在沿海地区增值的收益。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事实上,中央政府只要管好耕地的总量,而土地指标的跨地区交易可以既让沿海持续发展,又让内地更多地分享发展的收益。对于沿海地区来说,如果有更多的土地供应,对于控制土地价格和房价都有利,也可以进一步发挥经济集聚效应。对于内地来说,通过将土地指标转让,比本地直接用地可以得到更高的收益。何乐而不为?

也许有人会问,那群的话,内地省份总是发展农业,岂不是相对就越来越落后了?不会。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会带